

纪念上海解放 70 周年

倾听

“这种军队从来没见过！”

口述 张德全(85岁) 整理 本报记者 曹静

老百姓的日子 实在是苦得不得了

我家住川沙小湾,祖辈都是农民,上海解放时我才15岁。

解放前的这段日子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早点解放,因为老百姓的日子苦得不得了,实在过不下去了。

1948年,国民党发行了大量金圆券,物价飞涨,涨到了什么程度?今天的钞票明天就不值钱了。我原本在陆行中学读书,家里把棉花、粮食卖掉,换成学费,第二天拿到学校交。没想到昨天还够的,今天就不够了。陆行中学是读不下去了,1948年底我转到了合庆镇的一所中学。

虽然我年纪小,但对国民党的腐败和暴政体会很深。当时农村里有各种各样的税,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国民党不仅搜刮老百姓的钱财,还拉着老百姓去造碉堡。淮海战役一结束,国民党就在全上海全面造起了碉堡。我们川沙县就造了832个碉堡,都是钢筋水泥的,光川沙县城周围就有几十个,有的现在还能看到。

1949年过完年,我母亲就被拉去造碉堡了。那时她已经将近50岁,每天早上天亮就出发,步行到离家六七里地的白龙港、三甲港一带,每天挖泥、挑泥,直到下午五六点才回家。就这样被拉去造碉堡近三个月,直到5月15日川沙解放那天,早上7点,保甲长还在催促着我母亲他们去修碉堡,半路上听到枪声才回来的。

国民党不仅拉老百姓造碉堡,还强拆民房、烧毁民房。光我们白龙港、三甲港、小营房一带,就拆了1591间;高桥、洋泾、杨思一带拆了4953间,加起来是6544间。他们还打老百姓又打又杀,白龙港、三甲港、小营房一带,被国民党杀害的老百姓有67人,打



1949年6月,解放川沙后召开庆祝大会。

伤致残的有41人;高桥、洋泾、杨思一带,打死的38人,打伤20人。老百姓对国民党的残暴可说是忍无可忍。

当时,国民党强行规定,每家每户只要有18岁到42岁的男丁,都要摊派壮丁税,要是交不起就抽去当国民党兵。我外婆有个侄孙,20岁不到,父母都不在了,因为交不起壮丁税被拉了壮丁。大家都以为他死了,没想到淮海战役时被解放军俘虏了,解放后复员回来,大家都很惊讶。那时候,比我稍大一些的年轻人,晚上都不敢睡在家里,宁愿划船出去,躲在船上,生怕被国民党拉了壮丁。

一开始,国民党散布各种谣言,老百姓对解放军有些畏惧。但我一心盼着解放军。因为陆行中学地下党员很多,经常开展秘密活动。在他们的熏陶下,我知道了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一群人。一放学,我就悄悄地跟他们学扭秧歌,还偷偷学会了一首歌:“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不费一枪一弹 就解放了我的家

川沙的解放非常顺利。

1949年5月15日,三野第30军89师先头部队265团从南汇县祝桥沿霍公塘北上,兵分两路:一路沿霍公塘向北,经十一墩正面进攻川沙县城;另一路向西经关帝庙再往东北,进军包抄川沙县城。

霍公塘北起高桥黄家湾,南往南汇六团方向,沿塘小路窄桥多,重武器没法走,只有轻武器才能过。所以国民党军完全没料到我们会沿着霍公塘过来,被我军杀了个措手不及。有

几个国民党兵正在县南的十一墩街上走着,被解放军看见,打伤了几个。县城的守军一听枪声就逃走了,造的几十个碉堡一点用处都没派上用。当天上午10点多,川沙县城就解放了。

川沙县城一解放,88师的两个团又迅速向北挺进,解放了小湾、大湾、龚路镇。我家住在小湾北面,15日中午,我从自家窗户外看到街上解放军急行军路过,方才意识到,自己的家乡一枪不发就解放了。

差不多同一时间,5月15日早晨7点,88师263团1营先头部队沿坎公塘向北进攻,包围了蔡路小营房。国民党军队缩在碉堡里,负隅顽抗,战斗非常激烈。后来听说,我们的两名战士背起炸药包冲向敌人阵地,炸毁了碉堡,自己壮烈牺牲。最后,解放军抓获了国民党军的一个营长,敌人全部投降,解放了小营房。

解放小营房时还有这么两件事,让我们老百姓一下子感受到解放军的“好”。

我丈母娘家在坎公塘边上,解放军从南汇过来,攻打小营房,晚上路过这里,部队纪律严明,对老百姓很客气,看见我丈母娘,一口一个“大娘”“大娘”地叫。我爱人那时只有13岁,一开始吓得不敢出来,后来就敢了。部队晚上要吃饭,粮食是自带的,但柴草总要用老百姓的。他们在我丈母娘家灶头做了饭,要付钱,我丈母娘连声说不用,他们硬是给了钞票。

战斗打响后,国民党守军一面抵抗,一面还让老百姓帮他们运弹药、送伤员。我一个叔叔哥哥就被拉去了。解放军一个炮弹打过来,把一个国民党军官的腿打断了。他们就命令我这个叔叔哥哥和另外一个民工,跟着一个国民党兵把他送到高庙。他们早上去,没有遇到解放军,回来时遇到了朝北进攻的解放军,一点没被阻拦。他回来以后就

说:“解放军真好!”

5月16日,解放军又分东西两路,对白龙港一带的敌军发起了攻击。驻守这里的国民党军第51军,是12日从上海市区调过来企图守住这个交通要道的。我军16日晚上发动总攻,到17日拂晓,全歼国民党守军51军残部和暂编第8师残部,俘获第51军中将军长王秉钺,少将参谋长向建白,俘虏8000余人,26日,川沙县(包括横沙岛在内)全境解放。

没有他们的牺牲 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5月25日,激烈的高桥战斗结束以后,一部分部队撤回,分散驻扎在浦东各地,光川沙县就驻扎了第30军、31军两个军。

解放军进驻了川沙后,没有进到老百姓家里,而是驻扎在庙宇或教堂里,把一个天主教堂当作指挥部,真是“秋毫无犯”。

解放军对老百姓的东西也是有借有还。我因为在学校读过书,听得懂北方话,就给他们做翻译,帮他们借门板、稻草等等,还把自家仅有的一个碗借借给他们。我这么一带头,大家也都踊跃拿出家里的东西。

当时正是变热的时候,解放军还帮老百姓割麦。大家都说:“这种军队从来没见过!”“那真叫是人民子弟兵!”

川沙解放后,马上成立了军管处。5月20日,南下干部抵达川沙接管,当时来了70多人,现在活着的只剩2个了。5月21日,川沙县人民政府正式挂牌,成立了三个联合办事处,两个区政府,开始办公,当天就发布了三条命令。

1950年,我到合庆区委工作。在区委书记和区长的带领下,大家深入基层,到处搞调研。许多同志都是北方来的,听不懂当地方言,闹过一些笑话。比如,区委同志问老百姓:“这里吃白米的有吗?”老百姓回答:“我们穷啊,白米怎么吃得起?一年到头难得才吃。”区委同志又问:“哪户人家吃白米?”老百姓说:“家家人家都吃白米,但都是偶尔才吃!”我赶忙上前“翻译”:“北方话里的‘白米’就是‘白粉’,是问这里有没有吸毒的人,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后来我一直在川沙工作,退休时是川沙县人大副主任。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过许多解放川沙、解放浦东的解放军官兵,对这段历史十分熟悉。

浦东解放时,一共牺牲了2089名烈士。其中,安葬在高桥烈士陵园的有1619名,安葬在川沙烈士陵园的有343名,安葬在周浦的有127名。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到烈士陵园去扫墓。我80岁以后,父母墓地不去了,交代子女去,但我和老伴两个人还是照样去扫墓。为什么?70年前的这段记忆,实在是刻骨铭心。我们不能忘记革命烈士,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上世纪50年代初,张德全参加工作时留影。回忆起川沙解放时的情形,老人如数家珍。

“我们的队伍真像鲜花一样美丽”

口述 钱聿萍(92岁) 整理 本报记者 曹静

我生于1927年,老家在宁波梅墟镇。抗战时期,日军轰炸宁波,我随母亲和两个弟弟妹妹离开家乡,投奔在上海的父亲。我们沿着水路走,在小船上坐了几天几夜。中间遇到日本兵盘查,他们用枪托敲我的头,吓得我小命都快没了,一路上苦头吃足,至今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

我到上海时只有十三四岁,书读到小学毕业,因为经济拮据就没有升学,待在家里帮忙做家务。抗战胜利后,家境也没什么改善,日子仍旧不好过。

1948年,我结婚了。先生在中法大药房当营业部主任。他是宁波镇海人,从小家里也很穷,13岁小学毕业来上海,随身只有一个破箱子、一卷铺盖、一把伞、一张地图和一本字典。到了上海后,他进了中法大药房做学徒。药房卖西药,需要懂外文,他就拼命学,拼命做。他工作能力强,心直口快,看到不公平的事就要打抱不平。有一次起了冲突,老板停了他的工作。几个热心同事介绍他到其他药房里做事,后来才又回到中法大药房。

我年纪轻轻就成了家庭妇女,每天在家里做家务,除了买菜,平时都不大出去。当时,我们住在小东门方浜路,看看周围邻居,跟我一样的年轻妇女不少,有的靠搓麻将打发时间,我不搓麻将,喜欢看报,但还是没事做,觉得有些“厌气”。

1949年5月27日,一大早就听到有人说“解放了”“解放军都睡在马路上了”,赶紧跑出去,真的看到解放军,有的睡在马路上,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在站岗放哨。当时天还下着蒙蒙细雨,有居民招呼他们进门歇息,他们都婉拒了,不触动老百姓。亲眼看到这个场景,我很震惊,心里很激动:“有这样的好军队,我们国家有希望了!”

上海解放后,还有一件事让我吃了一惊。那就是我先生那几位热心同事,其实都



1952年10月1日,华东暨上海市各界人民庆祝第三届国庆节示威游行大会在人民广场举行。机关工作者中的女同志手持鲜花,向参加国庆游行的同志欢呼致敬。

是地下党员。当时我们只觉得他们非常热情,很有正义感,经常组织大家和资本家做斗争,为大家争取权益,心里十分钦佩,所以很乐于和他们来往。有几次,晚上10点钟,他们来敲我们家门,说工作晚了要借住,我们都热情地接待了。后来想想,一定是当时地下工作形势紧张,他们才到我家来避一避的。

上海解放给我的冲击和教育是很大的。我也想像那些地下党同志那样,为大家、为社会做事。于是,我走出家庭,开始参加里弄工作,介绍妇女同胞参加劳动,到工厂、商店、食堂、托儿所等单位去,接触社会,不要

脱节。1950年,经我先生同事的爱人、当年的地下党员吴翠娟同志介绍,我加入了黄浦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当时,黄浦区妇联有好几个办事处,我在第三办事处,组织妇女扫盲班、读报组、缝纫组,还宣传《婚姻法》,鼓励她们把子女送到部队大熔炉里锻炼。

当时单位开会都需要记笔记。没文化怎么记笔记?怎么把精神传达给妇女同志?我一面工作一面到夜校读书,也慢慢读到了初中毕业。

解放那几年,大家每一天都热情高涨。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抗美援朝时期,号召全国各界捐赠购买飞机大炮。我们妇女有钱的

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的会缝缝纫纫,就给解放军做军袜送到前线;家境较好的就捐钱,捐金银财宝的都有。我当时想,自己没行动,就没有号召力,就把结婚时的戒指捐了出来。很多妇女把自己的“私房钱”都捐出来,用手绢仔细地包好,收到打开看时还簇簇新的,大家见了都感动得不得了。

解放了,我们妇女真正翻身做主人了,每天都像过节一样。我最难忘的,是1952年10月1日的百万人大游行。

当时我是黄浦区妇联第三办事处的负责人,到里弄里去找小组长,许多女同志都围拢过来:“啥事体啊?”我说:“去参加大游行!”好多人都说报名,热情高涨。我说:“因为人数有限,一条弄堂只有五六个人可以去。”“还有条件:要年轻一点、身体好一点,有子女的家庭有人照顾,不然心不定。还有,要穿花裙子。”我说:“你们把家里最漂亮的衣服都拿出来,我两天以后来检查。”

两天后我来检查,哎哟,桌子上摊着一条条裙子,五颜六色,漂亮得不得了,全都符合要求。我很高兴。当然也安慰没去的人:“你们不要不开心。你们是后备力量,假使万一有人不来,我会喊人来通知你们。”结果没有一个人迟到,也没有一个人不来。

记得当时人民广场搭了一个检阅台,由市、区党政工团领导检阅游行队伍。我们黄浦区的妇女队伍打出一条鲜红的横幅,上面写着“黄浦区民主妇女联合会”,手捧大红花,穿着五颜六色的裙子,面带笑容,挥着五星红旗,高喊着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们的队伍真像鲜花一样美丽,我印象非常深。

我们在游行队伍里也看到了解放军,海陆空三军雄赳赳地走过来,神气得不得了。看着他们,我心里想:天下就是被这些人打出来的!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不会再被人欺负,那种日子不会回来了!



1949年,22岁的钱聿萍还梳着两条辫子,如今已是两鬓苍苍。从家庭妇女到党培养的妇女干部,她发自肺腑地感谢党、感谢解放。